

名家选集卷  
岑参集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名家选集卷|

岑参集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名家选集卷

# 岑参集

—唐—岑 参 —著 阮堂明 —解 评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博学工作室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岑参集 / (唐) 岑参著; 阮堂明解评. —2 版.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8.6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名家选集卷)

ISBN 978-7-80598-937-2

I. 岑… II. ①岑… ②阮… III. 唐诗—选集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0988 号

## 岑参集

著者：(唐) 岑参	解评者：阮堂明
责任编辑：宁志荣	审订者：宁志荣
封面设计：敬人工作室	版式设计：敬人工作室
责任校对：宁志荣	责任印制：李佳音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电 话：(0351) 4956036 (咨询) 4922268 (邮购)

传 真：(0351) 4922102

网 址：[www.sxskcb.com](http://www.sxskcb.com)

邮 编：030012

E-mail：[fxzx@sxskcb.com](mailto:fxzx@sxskcb.com)

印刷装订：运城日报社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字 数：165 千字

印 张：9.25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2 版

印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598-937-2

定 价：15.00 元

#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新闻出版署优秀畅销书奖  
全国优秀古籍图书普及读物奖  
第十七届晋版优秀图书一等奖

#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诸子百家卷



《诗经》 《楚辞》 《论语·大学·中庸》 《孟子》 《老子》  
《庄子》 《荀子》 《韩非子》 《孙子兵法·尉缭子·鬼谷子》  
《墨子》 《周易》 《山海经》 《吕氏春秋》 《三十六计》

名家选集卷



《三曹诗集》 《陶渊明集》 《王勃集》 《孟浩然集》 《高适集》  
《王维集》 《李白集》 《杜甫集》 《岑参集》 《韩愈集》  
《白居易集》 《刘禹锡集》 《柳宗元集》 《元稹集》 《李贺集》  
《杜牧集》 《李商隐集》 《李煜集》 《柳永集》 《欧阳修集》  
《王安石集》 《苏轼集》 《黄庭坚集》 《秦观集》 《周邦彦集》  
《李清照集》 《陆游集》 《范成大集》 《杨万里集》 《辛弃疾集》  
《姜夔集》 《元好问集》 《文天祥集》 《唐伯虎集》 《李贽集》  
《三袁集》 《张岱集》 《傅山集》 《纳兰性德集》 《郑板桥集》  
《袁枚集》 《龚自珍集》

史著选集卷



《左传》 《国语》 《战国策》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资治通鉴》

综合选集卷



《唐诗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 《元曲三百首》 《千家诗》 《古文观止》  
《汉魏六朝小赋骈文选》 《唐宋八大家文选》 《明清小品文选》

笔记杂著卷



《蒙学六种——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格言联璧》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 《世说新语》 《曾国藩家书》 《金刚经·坛经》  
《菜根谭·小窗幽记·幽梦影》 《浮生六记》 《闲情偶寄》 《近思录》  
《徐霞客游记》 《古代书信精选》

戏曲小说卷



《元杂剧精选》 《西厢记》 《牡丹亭》 《长生殿》 《桃花扇》 《今古奇观》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红楼梦》 《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  
《封神演义》 《话本小说选》 《文言小说选》

齊魯藏書  
莫道不消魂  
九萬里風煙  
中華書局印

·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生为《中国家庭基本藏书》题词



## 前言

唐明皇开元（713—741）、天宝（742—756）时期，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高潮时期，一时大家辈出，群星璀璨，涌现出像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昌龄、储光羲、常建、王之涣、崔颢、李颀等一大批诗人，他们天资极高，秉天地之气，得江山之助，或漫游天下，或从军边塞，或隐居山林，或求仙礼佛。他们立足现实，追求理想，将感性的生命欲求与理性的宇宙人生之思结合起来，在继承和发展魏晋以来崇尚超越、追求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思想的同时，也避免了魏晋士人耽于玄虚之境而表现出的虚无主义色彩。正是这种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与思想追求，盛唐诗人们创造出了大量兴象玲珑、骨气端翔、含蕴无穷、无迹可求的诗篇，从而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华章。如果寻求这个时期的诗歌主流，我们不能不将其归结为浪漫精神与理想主义。

不过，以往在描述盛唐诗歌的

这种风貌时，我们往往比较多地横向地从总体上作把握，忽略了盛唐诗四十馀年发展过程中的变化。美国汉学家史蒂芬·欧文（中文名字为宇文所安）在《盛唐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中将盛唐诗人分为三代。按照他的分法，孟浩然、王维、李白、高适、李颀、王昌龄、崔颢等属第一代，岑参、杜甫、元结属第二代，韦应物及大历十才子等则归为第三代。这种将盛唐诗人按代细分的思路，将盛唐诗作为唐诗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来看待，使我们对其发展过程及细节有了更具体、清晰的认识。不过虽然如此，这种分法仍然有未臻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按照这种分法，作为盛唐前期诗人的贺知章、包融、张若虚等被排除在了盛唐之外，而据《旧唐书·贺知章传》，“神龙（705—706）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生平看，他们创作的时期主要在开元年间，因此他们理应被视为盛唐诗人。其二，像韦应物及大历十才子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尽管主要出生于开、天时期，其创作则主要在大历之后，严格说来，他们的诗已不属于盛唐，而属于“后盛唐”时代的范畴。因此，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认为，盛唐诗人，以时代而论，应作这样的划分：一是盛唐早期诗人，以孟浩然、贺知章、张若虚、包融、贺朝等为代表；二是盛唐中期诗人，以李白、王维、高适、王昌龄、储光羲、李颀、常建、王之涣、崔颢等为代表；三是盛唐后期诗人，以杜甫、岑参、元结等为代表。

根据这种划分，作为盛唐第三代诗人的岑参，实际上也是这个时代浪漫诗潮最后的代表诗人。虽然从天宝初开始，盛唐诗歌的浪漫精神便因为朝政的腐败而趋向消减，贺知章天宝二年（743）告老还乡、李白天宝三年（744）被赐金放还，更具有这种消减的标志性意义。不过，由于巨大的惯性力量的影响，以及诗人各自遭际与经历的不同，对于诗坛当时的这种变化，这种消减，诗人并非同时感受到，或者感受的程度并不一致，有不少诗人仍然沉浸于以大唐帝国花团锦簇的繁华外表为背景的浪漫氛围中。如果说天宝三年以后，李白诗歌的浪漫精神逐渐淡化，还主要是受个人政治理想破灭因素影响的话，其他人则还大多未从这种沉湎中醒来，并仍然在惯性作用下，继续着具有浪漫精神的创作。直到天宝十一载（752），这种情形才发生了变化。这年的秋天，高适、薛据、储光羲、杜甫、岑参聚于长安，并一同登览慈恩寺塔。五人中以高适与薛据为年长，二人先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他三人相继唱和。正是在这次诗会中，我们看到了诗坛创作风气转变之机。这组诗



除薛据之作失传以外，其馀四诗均存于世。现存四首诗，杜甫、高适的诗均较为关注现实人生，尤其是杜甫的诗，作为诗人“登兹翻百忧”之心境下的创作，比之高适关注个人出路，更表现了对大唐帝国盛世不再及面临的命运危机的深刻忧患。莫砺锋先生在《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中曾认为此诗对于杜甫诗歌创作而言，具有转折性意义，标志着杜甫从“浪漫主义诗坛游离出来”，这种认识是非常准确和深刻的。由莫先生所论，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即当时诗坛创作风气，尽管因为杜甫开始酝酿着新的变化，但因为惯性的力量，仍然沿着浪漫精神的轨道发展。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岑参参与此次诗人之会所作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诗，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不妨先看他的这首诗：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  
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  
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  
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  
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从诗中可以看出，岑参表现慈恩寺塔的宏伟崇高之势，主要以夸张与想象性的笔触加以描写，尤其是诗的前半部分，意象飞动，神采斐然，体现了诗人天才般的想象力与充沛、活跃的诗才与情思。整首诗读来气势宏放，洋溢着浓郁的浪漫色彩与精神。从中不难看出作为与会诗人中年纪最小的岑参（岑参当时 36 岁，而薛据与高适均已 50 多岁，储光羲 46 岁，杜甫 41 岁）逞才使气，欲借与诸公“角力”、比试，以显示自我存在的意思。正如史蒂芬·欧文在《盛唐诗》中所说：“正如高适需要解脱与岑参并称而较缺乏才赋的名声，岑参也需要弥补作为名副其实的边塞诗大师的声誉。”（第十章《岑参：追求奇异》）不过，我们注意的，主要还不在此，而是岑参当时尚未注意到大唐帝国繁华表象背后

的深刻危机，以及受此影响而引发的诗坛创作风会的转变之机。事实上，岑参创作此诗时，人生尚处于低谷，其创作的个人化风格还未形成和确定。他作为盛唐年辈较晚的诗人，此前诗歌所积累的丰富诗学遗产，成为他创作的巨大财富，因此早年岑参的诗风主要在王维、孟浩然及李白的影响之下。虽然他早期的诗就精神实质而言，也具有鲜明的浪漫精神情调，但从根本上说，还有一定的模仿的因素，岑参个人化的风格与表现方式尚未形成。与此相应，虽然早在天宝八载（749），岑参已入高仙芝幕府，在西域经历了两年多的边塞生涯，但他第一次出塞所创作的边塞诗，并未展示出边塞异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风情。或许由于不得志的缘故，他首次出塞而作的边塞诗，更重在表达眷恋故乡的主题，诗歌成就总体而言并不大，并未将边塞诗特有的气势与格调表现出来。

不过，或许是受天宝十一载（752）长安诗人之会、尤其是与作为边塞前辈诗人的高适之会的影响，天宝十三载至十五载（754—756），岑参在第二次边塞经历中所创作的边塞诗，才真正开始了独创阶段，也将唐代边塞诗的创作带向了高潮，体现了盛唐诗歌浪漫精神的最后辉煌。这个时期，岑参因受封常清的赏识，意气风发，接连创作出《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火山云歌送别》、《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等一批堪称唐代边塞诗的经典之作，这些诗以西北广阔浩瀚的沙漠为背景，展示了边塞奇异瑰丽的自然风光与多姿多彩的异域风情，歌颂了戍边将士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皆洋溢着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的精神，体现了诗人豪迈壮大的情怀，具有崇高的审美特征。时至今日，我们读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等等诗句，仍然为其强烈的气势而震撼。比之传统的边塞诗多以乐府旧题写乐府，岑参这些诗在创作上多采取七言歌行的形式，克服了乐府旧题与所反映的实际生活内容之间的错位，能更直接、更真实地反映边塞生活。虽然以歌行写边塞诗非始于岑参，在李白的诗中已开其先河，但应该说，作为以边塞诗创作著称的诗人，岑参的这种诗歌形式在边塞诗的创作上运用得最多，也最成熟。岑参将豪迈不羁的性情与歌行体的自由形式高度统一起来，对于表现慷慨淋漓、壮大豪迈的情怀来说，是最恰当的方式。不过，我们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岑参这个时



期的边塞诗，从盛唐诗的发展背景来看，可以说是盛唐浪漫诗潮的绝响。诚如史蒂芬·欧文所言：“虽然岑参的边塞诗无愧于其声誉，他事实上处于传统的末尾，是最后一位广泛描写边塞生活的盛唐重要诗人。”其实，岑参不仅是“最后一位广泛描写边塞生活的盛唐重要诗人”，同时也是盛唐时期最后一位浪漫诗人。在他与西北边塞还沉浸于浪漫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唐代帝国当时不仅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更是面临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这个时期的李白，日益为自己的生机所困，处于焦灼、压抑的苦闷之中，并且随着年岁的增加，其创作已无复先前的神采。而此时的杜甫，更是早已完成了由浪漫向写实的转变，不仅创作了具有强烈讽喻精神的《丽人行》，更写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一具有诗史意义的宏伟长诗，全景式地再现了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唐帝国深刻的社会与政治危机。而同为盛唐后期诗人代表的元结也在进行具有新乐府意义的写实性作品的创作。只有岑参似乎还沉浸在大唐帝国的繁华之梦中。因此，他在天宝末期的诗歌创作，真正具有了盛唐浪漫诗潮最后绝响的意味！不仅如此，将盛唐诗歌放在古代诗歌史的背景下看，甚至可以说岑参也是中国古典诗歌浪漫精神的最后的诗人。

“盛唐浪漫诗潮的最后一位诗人”，是我们对于岑参的认识，也是对其诗史地位的评价。这种评价，我们认为是符合盛唐诗发展的实际的。限于体例与篇幅，我们这里还不便于对此作更详细与具体的阐述，但相信读者自会有更高明的认识。

本书所选岑参诗，以《四部丛刊》本《岑嘉州集》为底本，参考《全唐诗》本及今人陈铁民、侯忠义所注《岑参集校注》。在评解与注释中，也参考吸收了时贤的研究成果，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为方便读者使用，末附“岑参年谱简编”、“岑参著作主要版本”、“岑参研究主要著作”及“《岑参集》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注）。受编者学识及水平的局限，本书在篇目的选定及诗的注释、评解方面一定还存在不少失当甚至错误之处，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批评与指正，既帮助我们提高水平，同时也便于以后有机会修订时及时补正。

阮堂明

2008年8月



## 论岑参的边塞诗（代序）

高文 王刘纯

岑参(715?—770),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他的生平事迹大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他三十岁出塞之前。岑参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文本相太宗,伯祖父长倩相高宗,伯父羲坐太平公主谋逆遭诛,家道衰落。父亲岑植曾两任州刺史。参少年时,父逝,从兄受学,“能自砥砺,遍览史籍”(杜确《岑嘉州集序》)。十五岁时,到嵩山少室读书,在早期诗作中,可以看出他耽情山水,恬然自适的思想情绪。但积极用世,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二十岁,他“献书阙下”,赴长安求仕,结果是“金尽裘弊,蹇而无成”(《感旧赋》),失意而归。虽然如此,他继续为求仕而奔波,曾多次往返于京洛之间,还到河朔、邯郸、冀州、匡城等地漫游。他在《感旧赋》中写道:“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多遭脱辐,累迁焚舟,雪冻穿履,尘淄弊裘。嗟世路之其阻,恐岁月之不留。倦城阙以怀归,将欲返云林之旧游。”这个时期,交游多为僧人、隐

士，加之仕途失意，佛家的避世思想时而在他身上有所表现。

直到三十岁，岑参才应举及第。中第后只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他感叹地说：“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初授官题高冠草堂》）此后到他三十五岁出塞前的四、五年间，一直身居微职，未得升迁。但诗人并不甘心久沉下僚，仍然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

以后转入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从天宝八载（749）到至德二载（757），包括诗人的两次出塞。这是岑参一生中的重要时期。

和唐代其他从军边塞的文人一样，岑参也选择了在戎马生涯中开拓自己前程的道路，作以军功致位的人物。天宝八载冬，岑参第一次出塞，赴安西（今新疆库车）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掌书记。初次出塞，诗人的意气是昂扬的，他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诗中满怀信心地写道：“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但在两年多的军幕生活中，诗人并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天宝十载（751），他回到长安。次年秋，岑参和杜甫、高适、薛据、储光羲相会于长安，同登慈恩寺塔，相互唱和，各自写下了著名的诗作。他此时还避居终南山，写了一些送别、赠答的篇什。

天宝十三载（754），岑参被北庭节度使封常清辟为节度判官，第二次出塞。这次出塞由于受知于主帅，所以胸襟开朗，心情振奋，他写道：“何幸一书生，忽蒙国士知。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自逐定远侯，亦著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至德元载（756）又出任伊西、北庭支度副使。在北庭历时约三年余，足迹几遍整个西北地区，生活阅历大大丰富，视野更加开阔，加之有第一次出塞的生活基础，因此，创作达到了全盛时期，写下了许多气势磅礴、雄奇高亢、烂漫多彩的边塞诗。这些诗歌的表现领域空前扩大，题材多样，洋溢着爱国热情。他羡慕“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壮士，歌赞“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的唐军声威，称颂唐军战士“誓将报主净边尘”的报国精神。这些作品代表了诗人边塞诗的最高成就。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有很多是作者自己亲闻亲见的纪实，其中还保存了许多有关西北边疆古地理、交通、民俗、民族交往以及少数民族歌舞、音乐等史料，这在岑诗中是弥足珍贵的部分。

岑参生平的第三个时期，是从至德二载（757）直至去世。这一时期，岑参的仕履比较复杂。大约在至德二载的春夏之交，自边地东归，诣凤翔肃宗行在所，经杜甫等人的推荐，授右补阙。在谏官任上，他正直敢言，“频上封章，指述权佞”（《岑嘉州集序》），故为权贵所嫉。三月，



转起居舍人，四月，出为虢州长史。他写诗慨叹仕途的再次失意：“世事何反覆，一身难可料。头白翻折腰，归家还自笑。”（《衙郡守还》）虽然如此，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并没有减退。对安史之乱，诗人是痛恨的。在《行军二首》（其一）诗中写道：“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伤心五陵树，不见二京道。”并对安史叛军烧杀劫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愤慨：“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同时，诗人对“误落胡尘里，能持汉节归”（《送裴判官再归河阳幕府》）的爱国将士给予热情肯定，高度评价他们抗敌平叛的英勇行为，并对安史之乱的迟迟不能平定深表忧虑。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春，岑参被改授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关西节度判官。十月，任雍王李适（即唐德宗）掌书记，进讨史朝义。又迁祠部、考功二员外郎，转虞部郎中。永泰元年（765），出为嘉州刺史。因蜀乱，行至梁州而还。大历元年（766），蜀中崔旰叛乱，剑南西川节度使杜鸿渐入蜀平乱，表岑参为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列于幕府。入蜀途中，诗人写下了《早上五盘岭》、《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等诗作，反映了对消灭军阀割据势力的积极态度和渴望国家统一、百姓安宁的良好愿望。大历二年四月，赴嘉州刺史任，次年七月，秩满罢任。此时，他仍以天下事为念：“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对国家不宁、兵戈不息的局势表示忧虑。八月，东归乡里，因乱改道北行，寓居成都。五年正月，客死旅舍，终年约五十六岁。

岑参的诗歌，沈德潜《唐诗别裁》评云：“能作奇语，尤长于边塞。”边塞诗是岑参创作的精华所在。由于他“往来鞍马烽尘间十馀载”，“城障塞堡无不经行”，对边地生活有长时期的深刻体验和认识，所以边塞诗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

岑参边塞诗的主题是多方面的。首先，诗人热情歌颂边防将士豪迈的战斗生活、唐军的雄威和高涨的士气。在他描写战争的诗里，表现出充满胜利信心的英雄乐观主义精神，犹如一曲高亢激昂的战歌，读之使人鼓舞振奋。这可以用他第二次出塞时，在封常清率军抗击犯边之敌前夕写下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著名的七言歌行作为代表。其次，诗人以轻快的诗笔，真实地记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团结、和睦相处的动人情景。边境战乱平息之后，生活是和平安宁的，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诗人写道：“西边虏尽平，何处更专征。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奉陪封大夫宴》）“琵琶长笛曲相合，

羌儿胡雏齐唱歌。”(《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再次,是关于祖国西北边地奇异景色的描绘。在这些诗中,诗人更多地是在写景中倾注了自己热爱祖国、热爱边疆的深厚感情。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奇丽风光着笔,出人意想地用千树万树的梨花作譬喻,给人以无边春意的感觉。又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又如《火山云歌送别》:“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写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新奇世界。总之,在岑参笔下,飞雪、热海、火山等西域景物,不仅为过去诗歌未曾描写,也为“古今传记所不载”(宋许颐《彦周诗话》)。

另外,岑参的边塞诗中还有一些是描写边疆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的,如《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旋歌》等,描绘“北旋舞”的舞姿、服装、配乐及“旋转如风”的特点,对今天研究古代舞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有一些怀乡思家之作,如《赴北庭度陇思家》、《逢入京使》等,也写得感情真挚婉曲,十分动人。

总之,岑参是一个刻苦自砺、仕途坎坷、有进取报国之心的诗人。他的边塞诗意气昂扬,热情奔放,色彩瑰丽,富有浪漫主义特色,不愧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一个杰出代表。

作为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高适、岑参二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也有其各自的特点。

在生活阅历、政治理想等方面,他们的相似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两人就出身来说,虽家庭不同,但作为个人都是早岁孤贫。前期在求仕的道路上有着类似的坎坷遭遇,都曾于二十岁赴长安求仕,失意而归。其后选择从军幕府的进身途径。虽屡遭挫折,却不甘沉沦,奋发向上,积极用世的心情始终没有消失。

其二,两人都有立功边塞、慷慨报国的雄心壮志和爱国主义精神,并都从军边塞,有豪壮、艰辛的军旅生活和深刻的体验。

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就个人的生活基础来说,高适长期困窘,曾躬耕陇亩,“求丐自给”,生活异常艰苦。因此,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有切身的体验并深寄同情,他曾于燕地从军,往来于东北边陲,继又以县尉身份送兵清夷,看到了士兵生活的痛苦。岑参虽早孤,但仍有读书的机会,还能隐居少室,过较安适的士子生活。这对两人的思想感情是有影响的。

就个人性格气质而论,两人的差异也颇显著。“五十无产业,心轻



百万资，屠酤亦与群，不问君是谁”（李颀语）的高适，有落拓不拘、傲岸独来，无所牵挂、慷慨豪迈的特点。岑参身为士大夫之族，相门之子，虽充满爱国热情，但仕途失意时有些消沉，用世和退隐始终是他思想上的矛盾，且多思家怀土之情，而这些是高适所没有的。

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两人的诗作都洋溢着慷慨报国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也是边塞诗的一个突出特点。热爱祖国，维护唐帝国的统一，对于异族的侵犯，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是其创作的共同主题。所以他们在作品中都对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英勇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以热情的歌颂。如高适的《九曲词》对唐军收复失地感到兴奋鼓舞；在《送浑将军出塞》中塑造了一个忠勇为国、心情乐观的爱国将领形象；《燕歌行》则歌颂了士兵捐躯殉国的爱国精神。岑参在诗中也突出表现唐军将士“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送人赴安西》）的爱国精神，着力称颂唐军猛悍精锐、勇敢无畏的英雄气概（《轮台歌》），在《走马川行》中对唐军将士不畏狂风酷寒、连夜出兵抗敌、保卫边疆的壮举极力颂赞。

在这个爱国主义的统一主题下，两人的诗歌又各有不同的表现重点。高适的边塞诗主要表现了对士卒艰苦生活的同情，对“戍卒犹糟糠，降胡饱衣食”（《蓟门五首》）的不合理待遇表示愤慨；并揭露唐军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苦乐悬殊的黑暗现实，同情征人长期分离的痛苦等等。岑参的边塞诗则多是激昂高亢、热情洋溢的战歌，读之令人振奋。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都是这样。

在艺术方面，高、岑也多有异同。

其一，就其共同点来说，两人的诗歌都具有豪迈悲壮的风格。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云：“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结混茫。”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云：“高岑以悲壮为宗。”即指二人的共同风格而言。

其二，就二人诗歌的不同特点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创作风格上，高适诗以现实主义为主，风格雄厚浑朴，悲壮慷慨，骨气琅然。殷璠《河岳英灵集》说他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刘熙载《艺概·诗概》说：“高适诗，两《唐书》本传并称其以气质自高。今即以七古论之，体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岑参的诗则以浪漫主义为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殷璠《河岳英灵集》谓其：“语奇体峻，意亦造奇。”他的诗

具有奇情异彩，出语造句亦奇峭绝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高常侍、岑嘉州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至岑超高适，则趣尚各有近焉。”这个评议，正切合他们的诗风。

其次，在创作手法上，高适诗直抒胸臆，笔势豪健，《河岳英灵集》说他“多胸臆语”，即指其诗直接抒写自己的感情，语从心出。如他不能忍受县尉的羁束和屈辱的小吏生活而心情痛苦，说：“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安慰朋友的贬谪，说：“丈夫穷达未可知，看君不合长数奇。”（《送田少府贬苍梧》）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说：“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邯郸少年行》）勃郁之情跃然纸上，“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直抒胸臆，声情慷慨，高适为人尚节义，于此类诗可见。

岑参诗则擅长描写，善于用夸张、比喻等手法描绘景物，并在写景中寄寓感情，渲染气氛，如写狂风：“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炎热：“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写大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等。在岑诗中，几乎没有不与景物描写相联系的，或以景抒情，或寓情于景。元人陈绎曾云：“岑诗尚巧主景。”（《诗谱》）诚然。

复次，就诗歌的形式来说，二人均以七言歌行见长。高适的五古直追汉魏，写得浑成古质；岑诗形式丰富多样，五律、绝句亦饶有佳作，其五古清新奇逸，善于吸取六朝民歌和新体诗的成就。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云：“高黯淡之内，古意尤存；岑英发之中，唐体大著。”

总之，高、岑二人的创作虽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但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云：“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遒上，而婉缛过之。”王士禛亦云：“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师友诗传叙录》）他们的诗歌代表了边塞诗的高峰，并各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唐代诗坛。

高文（1908—1999），江苏南京人。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19岁入南京金陵大学中文系，曾师从国学大师黄侃、词学大师吴梅。1934年入金陵大学研究班，师从著名中国文学史家、书法家胡小石，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曾于西北大学、国立边疆大学任教。1951年，受河南大学中文系力邀而前往执教，直至去世。著有《汉碑集释》、《全唐诗简编》、《全唐诗诗句索引》、《王安石诗选》，与他人合著有《高适岑参选集》、《柳宗元选集》等。

以上“代序”为高文与王刘纯合著的《高适岑参选集》前言之节选，题目为编者所拟。